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被動回歸與公民社會的危機

Passive Return and the Crisis of Civil Society

doi:10.6752/JCS.201403_(18).0012

文化研究, (18), 2014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8), 2014

作者/Author：羅永生(Wing-Sang Law)

頁數/Page：210-21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3_\(18\).0012](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3_(18).0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論壇

《文化研究》第十八期（2014年春季）：210-216

被動回歸與公民社會的危機

Passive Return and the Crisis of Civil Society

羅永生

Wing-Sang Law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結束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治階段，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底下的特別行政區。由1982年中英草簽聯合聲明，鐵定香港「回歸」的政治命運算起，前後經歷了超過三十年的時間。三十年前，北京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作為口號開始，為未來的香港許下各種承諾，並制定了一部「基本法」。可是自1997以來，中共不斷對香港加強控制，人們對一國兩制的實施及基本法的效用日漸產生懷疑，中港矛盾日益加據，於是在部分香港人中間孕育出對英治時期的懷懣心情。這種心情的出現與香港整個「回歸」過程並沒有經歷對殖民經驗真正的批判有密切的關係。

一、勾結殖民的形成

英國以殖民方式管治香港150多年，為這個城市留下極其複雜的遺產。要了解香港，應先從它複雜的殖民性入手。香港原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港，在割讓之後漸次發展成殖民商埠。開埠之初，英人助力那些為清廷排斥的華裔沿岸遊民，雖然原本打算施行華洋隔離的殖民管治，但後來更多在東南亞一帶活躍的華人對在香港發展貿易，甚感興趣，於是蜂擁而至。統治的英人和華人之間漸次發展出相互合作的勾結管治模式 (collaborative rule)。這種以商埠作為貿易跳板的殖民模式，目的並不在於剝削本地本已匱乏的資源，而是要發展它為商貿活動的基地。它將商港的開發、城市基礎建設等，作為它推行的殖民現代化計劃的核心。

這種殖民體制，雖然依附於一個英國總督擁有差不多是獨裁權力的體制，也存在廣泛的種族歧視狀況，但體制所要建立的是鞏固有利商業運作的法治體制和商業管理模式，使得利益為華洋各族共享。這種筆者稱之為「勾結式殖民主義」的殖民形態，對香港社會的文化性格帶來深遠影響。它將整個社會屈從於功利計算、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價值，以此作為它唯一的信仰原則。但除此之外，在這塊殖民地之上，並沒有明顯的大英帝國改造香港人文化認同的計劃，也沒有給予一般市民發展民主政治的平等權利。英國殖民官壟斷政治大權，與被挑選的華人合作者(collaborators)共同分享利益。香港人受到普通法(Common Law)保障的基本自由，但殖民政府也嚴防各種挑戰政權的潛在威脅，在教育、文化及社會事務管理上長期執行剛柔並用的「非政治化」政策，一方面是文化上的不干預，另一方面也在不同時期選擇性地箝制民權和反政府活動。

這種獨尊功利商業理性為霸權的「殖民現代化」歷程，要確保一切都在殖民政權的駕馭的勾結統治框框底下，靈活而實用主義地利用一切可用的文化資源。例如，二十年代在總督金文泰領導下，為了防範五四激進主義自北南來，威脅殖民政府的穩定，更刻意地自行壓抑華人從教育中習得英國自由主義的機會，反而鼓吹被中國五四運動所唾棄的舊中國文化，阻礙了香港現代公民社會的成長與文化革新的步伐。自由主義文化只能局限在少數上層的華人精英之間，形成一種學舌式的紳士文化，卻沒有讓自由主義者成為挑戰政治及文化現狀的資源，甚至讓封建保守主義繼續在華人社會生根盤據。

不過，實用主義的殖民管治，亦同時令得英國人自我約制他們對香港文化活動的干預。所以，對近代中國兩大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香港推動的政治及文化活動，大致上並無禁絕排斥。而在二戰結束之後，香港成為一個難民社會，社會因冷戰期間國共對抗而撕裂。逃難心態亦使不少香港人寧可作殖民順民，遠離政治。除卻富有華商繼續與殖民政權建立共謀互賴的利益關係，「愛國資本」則選擇靠攏中共，報效祖國。在這種情況下，本土政治並沒有其他內容。在這情況下，與表面上的放任自由相伴隨的，是一個政治低度發展的

「非政治化」社會。大部分在香港土地上發生的政治，都是源於外來力量或者延伸的意識形態所推動。在熱鬧而相對開放的政治爭持下，本地社會卻是非常被動，欠缺主體性的「非政治化」，致使公民社會的發育、公民意識的提升十分緩慢。

二、解殖的難產

六七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親中左派借工潮一度發起「反英抗暴」的流血暴動，香港社會各種矛盾暴露，殖民體制方首次受到真正挑戰，但因極左路線和過度暴力而全盤失敗。七十年代，各種非由中共操縱的激進社會抗爭浮現，逼使港英政府開始「非殖民地化」計劃。一方面下放權力予華籍公務員，推行公務員本地化計劃，吸納部份本地青年菁英，另一方面推動教育和社會服務，在殖民體制下實現現代治理，目的是為英國最終撤出香港作準備。可是，由於這種種「非殖民地化」的部署是由殖民政府主導，並非由本地人積極參與的反殖民運動所帶動，它只著重於使殖民制度轉化成「有效率管治」的制度，並首要照顧曾被英人籠絡的華人統治階層的利益，並不旨在下放權力予社會，彰顯和建立受殖民管治人民的主體性，使他們重掌失去的民主權利。

80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主權決定移交中國，雙方共識是「平穩過渡」，而民意主流亦是基於冷漠和被動的心態。在「維持現狀」的願望不能實現的情況，卻又擁護保持一切不變。中英談判的過程保密，嚴拒任何香港代表的參與。後來基本法的起草，中方亦只聽任少數被委任的香港既得利益階層代表。於是，原殖民體制的框架被保留下來，美其名為「行政主導」。這種設計不觸及、不動搖、不改變原來的殖民權力分配格局。只是在高度自治的名義下，可以掌握殖民治術的舵手是新的宗主國中國。雖然「回歸」的理念建基於民族主義追求國家整合和統一的理想。可是，「回歸中國」卻並不按「民族國家」中一切國民擁用平等權利和義務的「國民國家」的理念而行，而是潛在地將北京政權視為僅僅是一個新的宗主國。而「宗主國」之

稱，在九七後亦大行其道。親北京人士亦朗朗上口，默認這種乃新的殖民關係。

在沒有香港人參與的回歸安排下，香港在1997經歷的不是解殖過程的完成，而是「被動的回歸」。香港人並沒有經過反思批判，行使自由的選擇去決定自己的未來。文化上，百多年錯綜複雜的殖民經驗被一筆抹煞，換來中共版本的愛國主義宏大論述，要求重塑香港人的文化認同，重新學習做「愛國愛港」的「中國人」。中共以愛國主義的名義代理香港人的解殖事業，脫離本地實際經驗，反而挑起部分香港人愈來愈強烈的對殖民文化的懷舊依戀，更感到在新的國族架構下，舊的不公義給延續下來，改頭換面之後其實是新的一套（類殖民）宰制關係。

在2003年香港人因為抗議23條立法，參加了史無前例的大遊行後，中央更收緊對香港政策，不惜以「人大釋法」箝制民主改革步伐，更以君臨之姿，全面加強對香港社會各界的統戰組織和籠絡工作，伸手改造香港的公民社會，以大量資源建構愈來愈強的「愛國愛港」陣營，介入傳媒、文化、教育各界，經營社區公益團體、宗族、同鄉、居民組織，無孔不入，介入及試圖操控大小選舉的結果，正漸步邁向建成一種國家統合主義(state-corporatism)。

三、虛擬自由主義

不過，在新舊殖民主義之間，香港並不缺乏自身的反抗運動。七十年代，香港土生土長的新一代受到世界性青年激進主義思潮的影響，開展了獨立於國共雙方的青年運動、學生運動，社區運動，在關心中國事務的同時向本地的殖民現狀提出質疑和挑戰。八十年代因為前途問題激發廣泛的政治意識覺醒，發展成推動香港民主改革的民主運動，爭取實現基本法所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多元議題的社會運動團體紛紛成立，百花齊放。不少論政團體後來更進一步組成大小政黨。九十年代因受中國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事件的震盪，「民主

抗共」意識增強，市民通過選票表達對親中建制的不滿，形成持續批判建制的「民主派」。這是香港人政治意識的一大飛躍。

但是，晚殖民時期急就章的民主改革，只是一個鳥籠式的民主試點。英國沒有給予人民建立可以反映自己意志的立法機關，中國也反對他們眼中會危及社會穩定的民主改革。但香港的反對運動並沒有成熟起來帶領有力的反對運動，而是在鳥籠當中，汲汲於煞有介事的議會選舉遊戲。主張重點放在議會選舉工作的「泛民派」政客、以從政為主要目標的政黨，與主張走民間抗爭路線的社運分子及團體，關係也日益緊張。因為民主政客往往並不積極於經營及發展社運，而是利用社運機會累積個人政治業積。為求爭取與官僚交換與合作，民主政客亦每每採取較溫和手法，著重談判協商而非抗爭。政治人物淪為被動民衆的代理人，群眾並不能發展自身的主體性。此外，泛民黨派亦被指默守成規，只關心在一個實質上只有部分民主，並沒有實質影響大政方針能力的議會內工作，以政治為一己仕途，卻沒有帶領民主運動取得實效進展的領導能力。在這些不同的批評下，泛民派日漸被不滿的群眾及社運分子視為推動民主運動的障礙。

2003年因為23條（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和沙士危險，導致超過五十萬人上街示威，首屆特首亦因而下台。香港市民的政治主動性大幅提升，可是，民主派未能把握機會爭取更快的民主改革。大遊行的後續影響只在如雨後春筍地發展的自發新社運小團體中找到。這些新一代的政治力量對親中建制不滿的同時，也猛烈批判泛民主派，種下日後激進政治組織「社民連」的興起，及2009年因一個策劃變相公投影響政改方案的運動（即所謂「五區公投」）失敗而導致的泛民大分裂。泛民派的嚴重分裂呼應著香港「一國兩制」在過去幾年急速破產的趨勢，象徵著八十年代回歸方案簽訂以來香港社會與政權之間默許的共識破滅。

這套共識筆者稱之為民主派恪守的「虛擬自由主義」，亦即明知體制並非建基於自由主義的鞏固憲政基礎之上，但仍然以假當真的按一套有如教科書般循規蹈矩的方式，不斷操演同一套民主儀式，儼如憲政自由主義是真實存在著。虛擬自由主義也可用作描述一套香港在

這三十年來的政治文化，在政治行動中，泛民所領導的運動盡量「優雅」守禮，顯露至「文明」的公民素質，嚴拒民粹主義，激進主義，堅守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不過，泛民分裂終結了這套虛擬自由主義共識，社會上不斷上演反對派陣營和新親建制力量的激烈對抗。泛民被狠批，社運人士也被新激進分子狠批。反對派內部群龍無首，內鬥分裂不斷上演。

四、公民社會的危機

在有限和片面發展的殖民現代性下，香港公民社會建立在虛浮的基礎之上。它在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是以中英共同恪守給予香港高度自治為前提的。但當前中共用「以我為主」的態度處理香港，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並不兌現。過去形成的虛擬自由主義社會共識瓦解，相伴隨的公民文化不足以規範社會運動，帶領民主改革。整個社會呈現不斷的分化和對抗。

大體來說，香港目前存在的挑戰主要有三方面：一、新殖民統治主義主宰大局，公民社會各個陣地失守。例如本來是一向以來離開中共影響力比較遠，甚至有某種反共傳統的基督教會，最近十年卻滋生出愈來愈強的文化保守主義和政治保守主義，橫移美式「基右」模式，並加以本地改造。他們主動向自由主義攻擊，部分更積極投入「愛國愛港」的親建制陣營，使教會成爲一種新興的親建制力量。他們的力量也不只在於教會內部，也間接透過他們組織的學校和慈善機構，成爲一種「維穩」力量，宣揚既是文化也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二、部分社運團體爲建制的統合主義所籠絡和吸納，漸次退化爲非政治化的利益團體，被保守的社工專業所規訓，成爲建制附從。三、近年興起的較有批判性的青年社運組織則囿限於自發主義的多元社運想像，敵我意識薄弱，較不重視建立團隊，未能在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下尋求最大團結，集中力量擴大人民自主空間。四、在溫和手段成效不彰的情況下，部份激進分子投身極端主義、心態日益虛無、放棄道

德底線。以激進姿態出現的犬儒主義者，對英治文化一知半解，一方面毫無基礎地懷緬殖民時代，高舉英殖旗幟，卻又全力摧毀英治帶來僅有的自由主義遺產，推動破壞多於建設的極右民粹主張，讓投機主義乘虛而入，無法真正走出一條捍衛本土自主的公民自強道路。

總的來說，香港當前面對的危機是一場複合的危機，是一場延擱了三十年尚未解決的「解殖未完成」的危機，也就是香港在1997年被動地走上「回歸」歷程，卻無法自一百五十多年來建立的獨有殖民體制及殖民政治文化走出來，建立屬於此地人民的政治及文化主體性的困局。任何走出此困局的嘗試，如果不從香港獨殊的殖民經驗出發，並作辯證反思，都只能是藥石亂投，離開主體性之路愈走愈遠。